

论徽商的文化自觉

王世华

(安徽师范大学,合肥 230039)

[摘要] 本文所谓文化自觉,是指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清醒的理性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且能够付诸实践。徽商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商帮,表现在如下几点:(1)敢于冲破传统的四民观,毅然走上经商之路。(2)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坚持商业道德。(3)自觉投身到各种文化事业中,对收藏、刻书、戏剧、书法、医学、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及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4)秉承正确的财富观,勇于社会担当。(5)不少徽商认清形势,自觉实现转型。徽商之所以有这种文化自觉,是因为徽商“贾而好儒”,有文化、有信仰。有文化就富于理性,能够正确处理各种问题;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文化和信仰,两者具备,才能升华为文化自觉。

[关键词] 明清;徽商;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127.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4)01-0018-08

研究徽商绕不过的坎就是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徽商为什么能够兴起?徽商为什么能够延续数百年,并发展成执商界牛耳的大商帮?徽商为什么对文化情有独钟?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但是若要认真思考,又感到意犹未尽,觉得这个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受到其影响,而影响之大小,全在于有无文化自觉,或文化自觉之高低。我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清醒的理性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且能够付诸实践。文化是商之魂。一个商帮或商人的任何表现,其实都是受文化支配的,是文化的外在反映。徽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她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商帮。

一、敢于冲破传统的四民观,毅然走上经商之路

徽商文化自觉的表现之一是:敢于冲破传统的四民观,毅然走上经商之路。两千年来,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士农工商是固化的社

会地位排序。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和提倡,社会上鄙商、贱商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即使到了明代,朱元璋仍然祭起这根大棒,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竟然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①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针对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农民外逃,招抚不还一事,朱元璋又谕户部“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迈出经商这一步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徽人大规模、前赴后继地脱农经商,那是在明中叶真正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后。明中叶思想界出现了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阳明创立了“心学”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学说,并简化为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古已有之的“四民说”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故

[收稿日期] 2013-10-15

[作者简介] 王世华(1948-),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卷六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八。

③ (明)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一,明万历刻本。

曰:四民异业而同道。^①真不啻为空谷足音。他甚至还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②王阳明的学说受到了人们极大的欢迎,“学其学者遍天下。”^③王学兴起后,其高足又通过收徽人为徒和赴徽州讲学的形式,迅速传遍徽州,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徽商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先进文化,在以下三点上取得了突破,表现了徽商的文化自觉。

一是认为商业不再是“贱业”。明嘉靖万历年婺源人李大鸿三岁丧父,长大后志存远大,他曾说:“人弗克以儒显,复何可以雄视当世?有语之阳翟(音狄)其人,埒千乘而丑三族,素封之谓,夫非贾也耶!”^④他就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以儒显耀,怎能雄视当世?但阳翟那里的人达到素封,照样雄视三族,他们不就是经商吗?可见其价值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德、嘉靖年间歙县人黄崇德,初有志举业,但其父文裳公对他讲“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他父亲完全服膺王阳明的学术,把“治生(经商)”放在第一位,希望儿子弃儒服贾。黄崇德乃挟资经商,终于“货累巨万矣。”^⑤嘉靖时婺源人李大祈,在经商的父亲死后,茆立当户,窘不能支。乃愤然曰:“丈夫志四方……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⑥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科场上搏取功名为父母争光,那么经商服贾,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他毅然弃去儒服,挟策服贾。正德、嘉靖年间歙商许侔先也决不把经商看成贱业,他曾经对别人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⑦只要勇于去干,都是应该肯定的。

二是认为商人不等于“奸商”。自从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以后,在所谓的君子看来,商人只要和利打交道,就是贪贾。所以,无商不奸成了社会对商人的普遍看法。但徽商却敢于冲破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只要赚取合理利润,就可以理直气壮。弘治、嘉靖年间歙人许大兴经过反

复思考,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自念道“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十一,贾之廉者亦十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⑧意思是说,虽然社会上一直认为以农致富为上,以商致富为次,但如果说耕者能获1/10之利,廉洁的商人也只取1/10的利润,那么经商又为什么比务农低一等呢?他认为古人不是痛恨商人,而是痛恨那些贪婪的奸商。想通了这个道理,许大兴毅然走出家门,踏上商途。到了明中期,徽州经商成风,万历《歙志·风土》载“商则本乡者少,而走外乡者多。昔为末富,今为本富。”连《歙志》的作者也认为经商和务农一样,是“本富”了。

三是认为贾不负于儒。在传统社会,士贵商贱,已成为人们固有的认识。但既然大儒王阳明都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和商应是平等的,商人没有必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明中期歙人程季公就常说“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⑨他认为虽然自己是一个商人,但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那就不比儒士差。这是何等气魄,何等自信!吴肖甫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父亲在武汉经商,希望肖甫同往,并说“岂必儒冠说书乃称儒耶!”^⑩难道非得戴儒冠读经书才是儒吗?徽商胡汝顺也说:“端木氏曾不以货值贬,儒奚必青衿乃称丈夫耶?”^⑪世人并不因为端木赐(字子贡)是大商人而贬低他,他照样是孔子的高足,司马迁照样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这样看来,难道非要穿上读书的服装才可以称为儒士吗?言下之意,商人同样可以像端木那样成为一个儒士的。于是他毅然贾和阳、淮海间,三年得倍称之息。

旧的观念一旦被冲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也就被驱除了,人们终于认识到,在徽州虽然务农之路越走越窄,但还有一条光明大道——经商,完

①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节庵方公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1页。

②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传习录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页。

③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一《答恽仲升论刘子节要书》,黎照庐丛书本。

④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恩授王府审理正碧泉李公行状》。

⑤ 歙县《棘塘黄氏宗谱》卷五《明故金竺黄公崇德公行状》。

⑥ 婺源《三田李氏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

⑦ 歙县《许氏世谱·西皋许公行状》。

⑧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

⑨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佾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安徽巡抚采进本。

⑩ 吴吉祐纂《丰南志》第五册《光裕公行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⑪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三《胡处士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第152册,第270页。

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下去。所以明中叶,大批徽州人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弃农服贾,徽商迎来了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二、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坚持商业道德

徽商文化自觉的表现之二是: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坚持商业道德。徽商贾而好儒,是儒商。儒商不仅仅表现为有文化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自觉按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经商,并能把儒家伦理运用到商业中,形成自己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以诚待人

“诚”是儒家思想中极重要的规范之一。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所以徽商自始至终以“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诚就是要诚恳待人。首先诚恳对待商业伙伴。其次要以诚对待顾客。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此不赘。

诚是一种信誉,也是一种财富。一个商人“诚”的信誉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他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才能获得这样一种荣誉。如黟县商人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始终以诚待人,“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贖为之,名重吴城。”他的商肆得到了人们的高度信任,实际上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晚年,吴荣命年老归里,“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可,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有识者韪之。”^②可见商人多么珍视“诚”的价值,把“诚”看得比金钱更重要。

徽商不仅在生意上恪守“信”的原则,在处理其他问题上也遵循着这一原则,使得一些矛盾得以顺利化解。如清代黟县商人汤永懿,他家所在的白干村,与邻村曾结下世嫌,矛盾较深。汤永懿虽在外经商,回乡后却妥善处理两村矛盾,方志记载“自永懿待以诚信,尽感孚。”诚信化解了两村的世代矛盾。在祁门经商时,江西浮梁船户为争夺码头聚众

到湖,将要发生械斗,“永懿访其谋主,动以利害,晓以大义”,真诚与信用获得对方的认同,事情得到很好的解决。祁门商人还有不平,要告到官府,永懿劝道“我黟粮食仰给江西,不杂沙水,受赐多矣。”从这个角度想想,应该感谢江西人啊!还有什么矛盾解不开呢?从此以后,双方友好相处,生意上的一些积弊也得到克服。^③

(二) 以信接物

“信”就是诚信、守信、信用,这也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④又说“民无信不立。”^⑤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孔子多次强调“主忠信”,就是说一个人要以忠信为主。

尽管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不断强调“信”的伦理,但在市场中我们还是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奸商以诈贸易,他们图的是“一锤子买卖”,从不知信誉为何物。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金钱的欲望泛滥,“于是诈伪萌矣,诤争起矣”^⑥,坑蒙拐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信”已被一些奸商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已为大量的材料所证明。但同样为大量的材料所证明的是,徽商从整体上说决不是这样。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在自己的经营行为中自觉地把“信”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

歙县布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⑦明代嘉靖万历时休宁商人程铨临终时,特留下遗言说“治生莫若勤俭,立身莫若忠信,此吾所常谈也。”近代绩溪人胡雪岩在杭州的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匾额,上面还有一段文字,是胡雪岩亲自起草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这块匾和文字,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显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完全是胡雪岩发自肺腑的真实思想。

讲诚信就必定守信用。黟县商人黄美渭,“幼

① 《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

②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志·尚义》,《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7)》第118页。

③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④ 《论语·为政》。

⑤ 《论语·颜渊》。

⑥ 万历《歙志·风土》。

⑦ 《古歙岩镇东礪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清抄本。

时,父为盐、典商,家颇饶裕。有戚汪某贷公款颇巨,浼渭父作保,会匪寇之乱(按指太平天国战争),汪某贫极,渭念信用所关,谋于兄弟代还之,其轻财好义如此。”^①按说,借贷者不是他而是他的亲戚,担保者也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他认为此为“信用所关”,于是与兄弟一起代为偿还。清婺源人毕周通,少攻举子业,以家贫弃而商。邻村故旧王某病笃,他儿子初喜尚幼,王某将周通请至病榻前,以六十余金托付周通,希望将来给初喜长大时使用,此事人无知者。周通回来后,另立一簿记其年月数目。“喜长,果苦无生计,日事樵采。(周)通知其克成立,乃置酒约其叔与喜至,出簿,权子母如数畀金。闻者骇为奇事。”^②这就是信用。

(三) 以义取利

“义”也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之一。孔子、孟子关于“义”的说教很多,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③就是说见到义而不去做,就不是勇敢。孟子也是如此。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④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把最安适的住宅空起来不去住,把最正确的大道舍弃在一边不去走,这可真是悲哀啊!”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义”应放在第一位,“利”是第二位的。要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而决不能见利忘义。

儒家的这些观点,对徽商影响很大,他们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自觉地加以践行。明代嘉靖时歙县商人汪忠富年青时在淮泗经商,年老时命长子继业,并对他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⑤这是一种高度的职业自觉。这种自觉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徽商的共识。明嘉靖万历年婺源人李大嵩在云间(今上海)、白下(今南京)经商多年,他向继承的人传授所谓的经商秘诀就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⑥也是将“义”放在

首位。道光时黟县人舒遵刚更是如此,他曾对人说:

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暇观他书哉!

“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可以说是徽商的行为准则。明歙商胡山经营粮业,有年运粮至嘉禾,正逢饥荒,“斗米千钱”,同行有人建议在米中掺杂一些沙石和霉米,这样即可赚大钱,胡山坚决不同意,他不愿赚这个昧心钱。^⑦清代婺源商人汪源茂开店营业,有一朋友拿出数百两银子假托源茂之名放在店中生息,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忽然一天朋友暴卒,“伙未悉其故,以银归茂,茂不受,召其子还之。”^⑧婺源商人江灵裕一生重义好施,“尝贾于温州,总理茶务。有恒泰银号沿市籍未销,误兑四千金,裕悉返之。”不仅如此,族中有人欠灵裕一笔钱,此人死后,“其妻将田偿,裕念薄田数亩,孤孀且不能度活,坚不受。”^⑨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

(四) 以质取胜

徽商讲求“诚”、“信”、“义”,那么商品质量实际上就是“诚”、“信”、“义”的必然要求,或题中应有之义。

以质取胜,首先表现在商品的质量上。前述胡雪岩在胡庆余堂大厅上悬挂的《戒欺》匾额,提出制作中草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就是确保药品的质量,所以另一幅匾额上又写道“真不二价”。由于胡庆余堂生产的中药货真价实,质量上乘,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明万历年休宁人汪

① 民国《黟县四志》卷七《人物志·尚义》,《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8)》,第95页。

② 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③ 《论语·为政》。

④ 《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

⑤ 《汪氏统宗谱》卷三《行状》。

⑥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李公行状》。

⑦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三《胡仁之家传》。

⑧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

⑨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一龙,字正田,精通中医药,在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垂二百余年,凡九世皆同居。”为什么他的药店能够经营二百余年,就是因为该店“慎选药材,虔制丸散”,“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深得老百姓的信任,不仅“四方争购之”,就是“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湖,市药而归。”^①

胡开文墨店制作的墨也是如此,乾隆年间,绩溪人胡天注在休宁创立胡开文墨店,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近200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誉满全球。就是因为胡开文的创始人胡天注生前立下了一个重大原则,以后历代传人都坚决贯彻了,这就是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从而确保了墨品的质量。

三、以极大的热情,自觉投身到各种文化事业中

徽商文化自觉的表现之三是:以极大的热情,自觉投身到各种文化事业中。经商是为了赚钱,而文化事业是耗钱的,两者是矛盾的。所以很多商人对文化事业是不屑一顾的。而不少徽商却对文化事业诸如收藏、刻书、戏剧、书法、医学、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仅仅是自己的兴趣使然,更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对文化价值的肯定,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

盐商鲍廷博家有“知不足”藏书斋,立志精选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连续刊刻二十六集,自己已86岁高龄。翌年辞世后,其子士恭又刻了二十七、二十八两集也辞世,廷博孙正言再续刻二十九、三十两集。《知不足斋丛书》问世后,不仅受到皇帝的嘉赏,更受到广大士子的热烈欢迎。时人如此评述“歙县鲍涑饮廷博辑刻《知不足斋》丛书,久为艺林推重,约而言之,盖有数善:全书三十集,都二百余种,搜罗之富,实罕其比;所辑各种,或旧刻脱讹而此独完好,或中土久佚而传自海外;无陈陈相因之弊,且皆学者必需之书,采辑之善,允推独步。”^②时人曾论刻书之难有三“所据必善本而后可,一难也;所费必多资而后可,二难也;所校必得人而后可,三难也。”^③尽管有三难,但鲍氏子孙知难而上,尤其是“梨枣之材,剞劂之匠,

遴选其良,费而勿靳。生产斥弃,继以将伯(向人求助),千百锱铢,咸归削氏。犹复节衣减食,裨补不足,视世间所谓荣名厚实、快意怡情者,一切无堪暂恋,祇有流传古人著述,急于性命。”^④把“流传古人著述”看成是“急于性命”的大事,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能做到吗?盐商马曰琯也是如此,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他不但大量藏书,也将一些珍贵著述付梓。为了把最好的版本贡献给社会,他极其认真地进行校对,“珠簾十里,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间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⑤这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能做到吗?

清代嘉、道年间淮南总商鲍志道之子、收藏家鲍漱芳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自己的文化自觉。他们父子收藏了唐、宋、元、明诸多名家书法40余件,这是旷世瑰宝。怎样才能让它们永久保存并能让人利用呢?鲍漱芳欲将它们勾勒上石,为此重金延请扬州名匠党锡龄(字梦涛)等精雕细刻,生动再现了原作的精神风貌。鲍漱芳死后,其子鲍冶亭、鲍钧亭继续这项工程,这就是著名的“安素轩石刻”,共300多方。它始于嘉庆二年(1797年),成于道光四年(1824年),历经3代、28个春秋。“安素轩石刻”大部分是按真迹或原作勾摹刻制的,且皆有名人题跋,许多是首次见诸刻石,其中唐勾本王羲之《兰亭集序》、李邕书《出师表》、苏东坡诗、米芾小楷、赵孟頫书《老子》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可以说,“安素轩石刻”是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现扬州天宁寺内陈列的175方石刻,乃鲍氏后人、画家鲍葵先于建国初捐献。可见鲍氏家族为保护和传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书法艺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其他诸如徽商倾囊收藏、捐资助学、兴办家班、助士刻书、养士研学等等举措无不表现了徽商的文化自觉。

四、秉承正确的财富观,勇于社会担当

徽商文化自觉的表现之四是秉承正确的财富观,勇于社会担当。徽商致富后,如何对待这些财富?是奢侈挥霍,还是求田问舍?无庸讳言,这样做的徽商也是有的。但大多数徽商还是能够正确

① 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十八。

② (清)鲍廷博辑、鲍祖志续辑《知不足斋丛书》,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启》据清鲍氏刊本景印。

③ ④(清)顾广圻撰《思适斋集》卷十二《知不足斋丛书》序,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⑤ (清)全祖望撰《鮑埼亭集外編》卷十七《丛书楼记》,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对待自己的财富的,尤其是在赈灾救荒、扶贫济困方面以及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勇于社会担当。他们在家乡或在经商地,架桥济渡、铺路利行、年夜散银、义田助学、义山埋龕等等,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记载。他们做这些事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恻隐偶动呢?不是的。他们的这些行为完全建立在他们的文化自觉上。徽商贾而好儒,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已成为他们自觉的指导思想,是他们一切行为的起点和归宿。那么,儒家的哪些思想在影响着徽商呢?

“积而能散”。《礼记·曲礼》曰“积而能散,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明代歙商黄崇敬在扬州业盐致富后就说过“积而能散,礼经明训。”于是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①“积而能散”的思想对徽商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徽商的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行为就是来源于儒家的这一思想。

天命观。儒家思想是讲天命的,孔子就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②认为天是无所不知的,人间的行事一定要按照天的意志去办。天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天道,它是不可违背和抗拒的,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③那么,什么是天道或天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④连子贡也不清楚天道究竟是什么,所以后世人们只有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理解了。清代学者魏禧曾有一大段话就说到的人和天的关系:

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善,则天地之心病;心病则耳目贸乱,血脉荣卫交错,而百病作。是以有日蚀星变,山崩地震,水溢旱干之症,人民横死,盗贼发生,牛马鸡狗鱼鳖林木卉草金石之物,皆不遂其性。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灭;人不行善事,人性绝。”

接着他又写道:

人性本善也,善存于心,不见于行事,是贮五谷之嘉种而不春渐以甕也,其实与穷饿而死同。

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如果善仅存于心中,而不去付诸行动做善事,那就好比积贮了很多

五谷良种而不去煮饭供人享用,这与穷饿而死是没有区别的。他又进一步写道:

且夫天下之人至众矣。穷困者众,何以吾独丰于财?愚者众,何以吾独智?盖天地者,万物之父母,天下众人,天之众子也。天以此子为贤,故丰之,使恤众子之贫;故智之,使教众子之昏。父母以众子之故,独厚此子,而此子乃弃众子而不恤,封其财,私其智,骄吝横生,视众子者,乃草木鸟兽之不与,我同类则为父母者,安之乎?抑怒而夺其所厚乎?且人之夭折死亡者常也,饥寒兵寇刑狱疾病无不足以杀人,吾何以独生于世,是天将使之救众子之死也。故人生而不行善,则其去死人也无几何矣!

就是说,天下人是非常多的。穷困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独独我富有?愚笨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独独我聪明?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天下众人都是上天的儿女。天认为这个人贤能,所以有意让他富足起来,以抚恤上天其他贫穷的儿女;上天有意让这个聪明,是让他教育上天其他愚笨的儿女。上天这个父母为了众多子女的缘故,对你特别宽厚,让你富足,让你聪明,是为了帮助、教育其他儿女。而你却弃众子而不顾,独享自己的财富和智慧,既骄傲又吝啬,把上天的其他子女看成是草木鸟兽一般,我们同类人能看得下去吗?或者说不会怒而夺取你的一切吗?况且人生在世,夭折死亡是常有的事,饥寒、兵寇、牢狱、疾病无不可以叫人死,你为什么能独生于世,是上天让你拯救众子啊。所以人生而不行善,则与死人也差不多了。

上述话虽然很长,但核心就是说,你的富裕是上天给的,上天让你富裕不是让你去享清福,而是让你去帮助穷人。这是上天交给你的任务,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你如不去帮助穷人,说不定哪天上天就会收走你的财富,让你一无所有。^⑤

这种思想实际上代表了很多人对人天关系的理解,徽商可以说也是这样。徽商鲍士臣就认为:“饶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

① 歙县《蒧塘黄氏宗谱》卷5《明处士竹窗黄公崇敬行状》。

② 《论语·季氏第十六》。

③ 《论语·八佾第三》。

④ 《论语·公冶长第五》。

⑤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十《序》“善德纪闻录叙 为闵象南作”第255-261页,清宁都三魏全集本。

其当而已矣。”在他看来,意外赚来的钱,浪费奢侈就是“暴天”,吝啬、舍不得帮助别人就是“违天”,“暴天”和“违天”都要得罪天,所以他不仅“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而且大力帮助别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①绩溪章策“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日以裕。”但他慷慨好义,力行善举。他曾说“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教愚,富者贍贫,不然则私其所厚而自绝于天,天必夺之。”^②可以说徽商之所以那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是出于对“天”的敬畏心理。

义利观。儒家关于义利的系列论述是徽商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见利思义,见危授命”^④、“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⑤对于孔子的这些论述,徽商都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徽商尽管成天与钱打交道,但他们并没有忘记义,意识到“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⑥在义利关系上,徽商是能够遵循儒家的原则的。因此,当获得一定的利之后,怎么去支配它?他们首先就想到义。清代道光年间的黟县商人舒遵刚,他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曾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⑦

他把以义为利作为生财之大道,把“吝惜而不肯用财者”和“奢侈而滥于用财者”,都认为是自竭财源之流,而“因义而用财”正是所谓“大道”。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才见义勇为,散财助人。

“满招损”。满招损,也是儒家思想。《尚书·大禹谟》就说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这实际上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出了满和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为了避免满招损,就必须在满的

时候要拿出财富帮助别人,这是天道。被誉为“大善人”的徽商闵象南就是这样想的。当他大力行善时,有人劝他留些财富给后代,他说“扑满有人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中人产得乎?”^⑧扑满,为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陶制盛具,类似于今天的储蓄罐。古人将钱装满后,则将其敲碎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闵象南致富后,就是“惧其扑,故不敢满”,所以他要大力行善。同时他也认为,留给子孙财富多了,不是好事,也怕他们“满则扑之”,那时就是想维持一个中人之产也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很多徽商也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徽商是有文化的、有理性的,事物的道理他们是非常明白的。

五、不少徽商能够认清形势,自觉实现转型

徽商文化自觉的表现之五是认清形势,自觉实现转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外国商品充斥国内市场,外国资本也进入中国市场,新型的现代企业开始兴起。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面对这一大变局,有的人懵懂无知、浑然不觉;有的人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有的人抱残守缺、我行我素。但也确有一些徽商能够认清大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毅然转型,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上海的一批徽商及其子弟,主动学习外语,与洋人打交道,先后成为我国早期的买办商人,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徽商放弃数百年一以贯之的传统经营方式,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创办企业。20世纪初,当电灯传到我国以后,在芜湖经营的徽州绩溪商人吴兴周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新生事物。他克服种种困难,到上海取经,经过几年准备,终于在1906年与几位同仁创办了安徽第一家发电厂:“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德国西门子洋行承办厂房设计、设备购买和安装,1908年底送电。当时程宝珍是董事长、大股东,也是徽商,吴兴周任经理。这一举措就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自觉。

① 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鲍先生传》。

②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六《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绩溪章君策墓志铭》。

③ 《论语·述而第七》。

④ 《论语·宪问第十四》。

⑤ 《汪氏统宗谱》卷三《行状》。

⑥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

⑦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十《序》“善德纪闻录叙 为闵象南作”,清宁都三魏全集本。

再如晚清徽州休宁的茶商周聿修,长期在汉口经营茶叶。但他是位很有远见的商人,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他决心把独子贻春培养成知晓中外的洋务人才,不惜重金聘请教师在家教授贻春英文,终于在庚子前后考入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圣约翰书院读中学,以后才得以赴美深造。回国后1913年10月继监督(后改称校长)唐国安后为清华学堂也即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这位茶商就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还有一些徽商投资开矿、购买轮船、创办银行等等,自觉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但遗憾的是这只是少数,多数徽商未能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随之转型,仍然固守着传统的经营行业和经营方式,表现出文化自觉的缺失,因而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六、余论

徽商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自觉?就是因为徽

商是“贾而好儒”的商帮,是有文化、有信仰的商帮。一个人如果文化素养高了,他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就会富于理性,就能抓住事物的关键,一般不会失误。经商就需要这样的理性。商业活动非常复杂,市场形势变化无常,需要准确判断;经商要和顾客打交道,很多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商业团队内部关系也需要妥善协调等等,这些都需要理性对待。有理性就能正确地分析一个事物、一种行为的利弊得失,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先知先觉。徽商之所以大多发展较快,应该说与他们善于处理这些问题是有关的。但是,仅有文化还不行,还得要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文化和信仰,两者具备,才能升华为文化自觉。这是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区别所在。当然,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作为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大商帮,并非说徽商的每一个个体文化自觉性都是一样的,也不是说徽商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这是毋庸讳言的。

O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Merchants From Anhui Province

WANG Shi-hua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o-call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a clear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a certain matter. It shows certain advancement and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Merchants from Anhui province are a business group who are culturally conscious. They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 They have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imin and determinedly go on the road of doing business. II. They are able to have a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y consciously adhere to business ethics. III. They are consciously engaged in a variety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They show great enthusiasm for collection, engraving books, plays, calligraphy, medicine and education. This is a kind of awe of culture and the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IV. They adhere to correct concept of wealth and have courage to take on social tasks. V. Many merchants from Anhui province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have consciously achieved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eason why merchants from Anhui province have thi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that they are “businessmen and yet love learning”. They are educated and have faiths. They are educated so that they are rational and handle issues properly; they have faiths so that they have the fear and practice consciously. They are both educated and having faiths, which results in the sublimation to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Merchants from Anhui provin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r. Zhang Jing; Cui Xianquan)

(责任编辑 张阳)